

# 中国为何没有易卜生？

傅谨

2006年9月12日《北京日报》

—

## ——由《〈人民公敌〉事件》想到的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和戏剧影视所联合演出的《〈人民公敌〉事件》用这样的台词质问我们的心灵，而我们在舞台上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真实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戏剧了？

《〈人民公敌〉事件》是大戏节举办以来最厚重的收获。它写的是一群大学生暑假期间回到淮河边的家乡，他们目睹淮河遭受的污染给家乡带来的灾难，突发奇想，要排演易卜生的名剧《人民公敌》，然而排演的进程就是遭到来自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的过程，在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前，几乎所有学生都放弃了抵抗，他们的青春被刻上一道最深的创伤。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今天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类似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挪威，更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发生在作者所写的淮河边，还在更多地方普遍存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是写一位有理想、有信念的医生朴素的是非观念在现实面前遭遇的挫折，他要对真相负责的态度在公众利益面前显得何等幼稚。斯多克芒医生发现了正在给这小镇带来繁荣的海滨浴场水体遭受了污染，而易卜生要问我们，当他要把这一重大的、既会危及游客健康同时也会危及小镇居民自身的真相公之于众时，为什么他竟然成为“人民公敌”？在如此简单的是非面前，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如此轻易地、且似乎是如此地天经地义地放弃了那如此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毋庸置疑的真理？通过这出戏，易卜生更想写出人类就像《人民公敌》里的小镇官员和居民一样，不仅对于正在毒害着人类的那个精神领域的海滨浴场熟视无睹，而且在勇敢地揭示真相的人站出来时，反而竭力想要扼杀他的声音。

吕效平等写的《〈人民公敌〉事件》，恰是借这一名剧，同时借一群大学生与这出名剧的一次精神对话，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大学生存在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因此，《〈人民公敌〉事件》包含了双重的隐喻。而当这出戏成功演出时，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它的第三重隐喻，通过它我们更可以反观

自己:今天的戏剧舞台上之所以没有《人民公敌》这样的作品,不是今天的中国不存在类似的问题,恐怕也不仅是我们的剧作家们缺乏易卜生的才华,而恰是由于戏剧界也正在演化为《人民公敌》里的那个小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人都会在这出戏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人民公敌〉事件》是大学生戏剧节举办以来最厚重的收获,也许比这六届里所有其他参演剧目加在一起还更厚重。而这出戏既来自大戏节关注的视野之外,也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戏剧家们的创作。在为《〈人民公敌〉事件》的成功演出而兴奋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由此思及多年来大戏节的活动以及大戏节的眼光和宗旨的偏颇,并且更进一步思考多年来主流戏剧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大戏节的多数参演剧目缺乏大学生们应有的现实关怀,缺乏精神的纯粹与思想的力量,《〈人民公敌〉事件》是个异数,它对大学生戏剧的冲击力,相信所有参与者都会有切身感受。在大戏节的松散而自由的环境面前,我们不能够以受到种种题材、主题或表演上的限制或其他现实的压力自我开脱。《〈人民公敌〉事件》恰巧也用戏剧化的手段间接地指出了这点,它写的不仅仅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媒体给排演中的大学生们造成的压力,更是在写一群原本应该更有理想的大学生怎样在压力面前早早地就学会了放弃。如同剧中主人公李想对自己也是对所有同伴的追问:“难道我们早晚要放弃做自己吗?……二十岁不放弃,三十岁也会放弃?三十岁不放弃,四十岁还是得放弃?可是我们毕竟才二十岁啊!我们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或许这并不是大学生们自己的困惑,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大学生的最大困惑之一。作为和编剧之一吕效平的同代人,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在十五岁时便因为“文革”早早地成熟,而直到三十五岁还有为天下忧的激情冲动,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过了三十岁还不成熟,而不到二十岁就早早地变得老成?为什么理想的光芒还来不及绽放就灰飞烟灭了?这当然不是大学生们自身的问题,其实我们从《〈人民公敌〉事件》的演出中也可以感受到,当走上舞台的大学生渐渐融入到戏剧情境中时,他们完全足以理解与领悟这出戏里的精神内涵,由此可见,不是这一代大学生没有精神追求。是我们的艺术很少像

《〈人民公敌〉事件》这样足以警醒和振奋他们的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优秀作品,是我们的社会缺少易卜生,以及缺少易卜生成长的土壤。由于艺术和社会的缺失,大学生们丧失了真正的理想,他们才如此容易放弃。

大戏剧太需要《〈人民公敌〉事件》这样的佳作。不仅大戏剧需要，而且中国戏剧需要，中国需要。

厦门大学图书馆